



## 我们时代的神曲

Our Era's Divine Comedy

谷文达 Gu Wenda

### 引言 持续性世界范围的艺术计划：“联合国”（1993—2000）

“联合国”是缘起于1992年初的一个持续性世界范围的艺术计划。从1992年初到1993年底，我构想了一套涉及复杂策略和方法的观念和执行计划。在这个漫长的思索阶段，我曾经怀疑自己能不能成功地构想和实施这个在观念、物质、时间、政治和种族方面困难重重的艺术计划。但是当我清楚地看到这个计划对我、对其他民族和他们的文明的深刻意义和挑战性时，我的信念变得坚定了。我觉得，作为我所要冒的巨大风险的结果，“联合国”计划可以为作为一个个体艺术家的我提供一个绝佳的机会。

在十年以上的时空中，“联合国”艺术计划将巡回五大洲，在大约二十个国家（和地区）实施，国家（和地区）的选择主要根据他们的历史、文明和政治上的意义而定。通过使用当地在世居民的真实头发，我将密切结合他们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在每个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创造纪念碑性的装置和大地艺术以凸显每个国家的身份。这些独立的装置将成为“联合国”整体计划中的国家纪念碑。

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天，我将建成一个整合各个国家纪念碑事件的巨大的人发墙。人类大同的“乌托邦”也许永远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但它将在

艺术世界完全实现。

有点矛盾的是，人发墙中的每块人发砖都将保持自己的身份。从中国的长城到柏林墙，墙本身一直具有分离的寓意。各种族的人发制成的砖的重叠意味着对抗、冲突、战斗，最后是在“联合国”这个人发砖墙中得以整合。

在“联合国”计划最后实现的时候，借助世界上许多文化机构和当地理发店的支持，将有成千上万不同的活着的种族在人发墙上呈现。

“由我们所在的世界的跨文化现实的扩展引发的这个新课题进一步引出了许多新的艺术课题。人类再次进入一个新时代，一个实际上可以界定为‘星球的’新的历史时期。在现时的展望中，谷文达的‘联合国’计划是进入这个关于文化和文化差别的新概念和予以实施的明显的征兆，他将其准确地界定为‘跨文化主义’。”

“这是另一个宝瓶世纪的曙光吗？还是在过去几十年孕育了‘人的家庭’和‘我们就是世界’这样的艺术事件的利他冲动的多元文化现代版？或者它是对二十世纪末强化了且迅速变异的种族观念和民族主义的重新审视？”

观念，策略，方法 它者/异化/差异，生物/地缘/文化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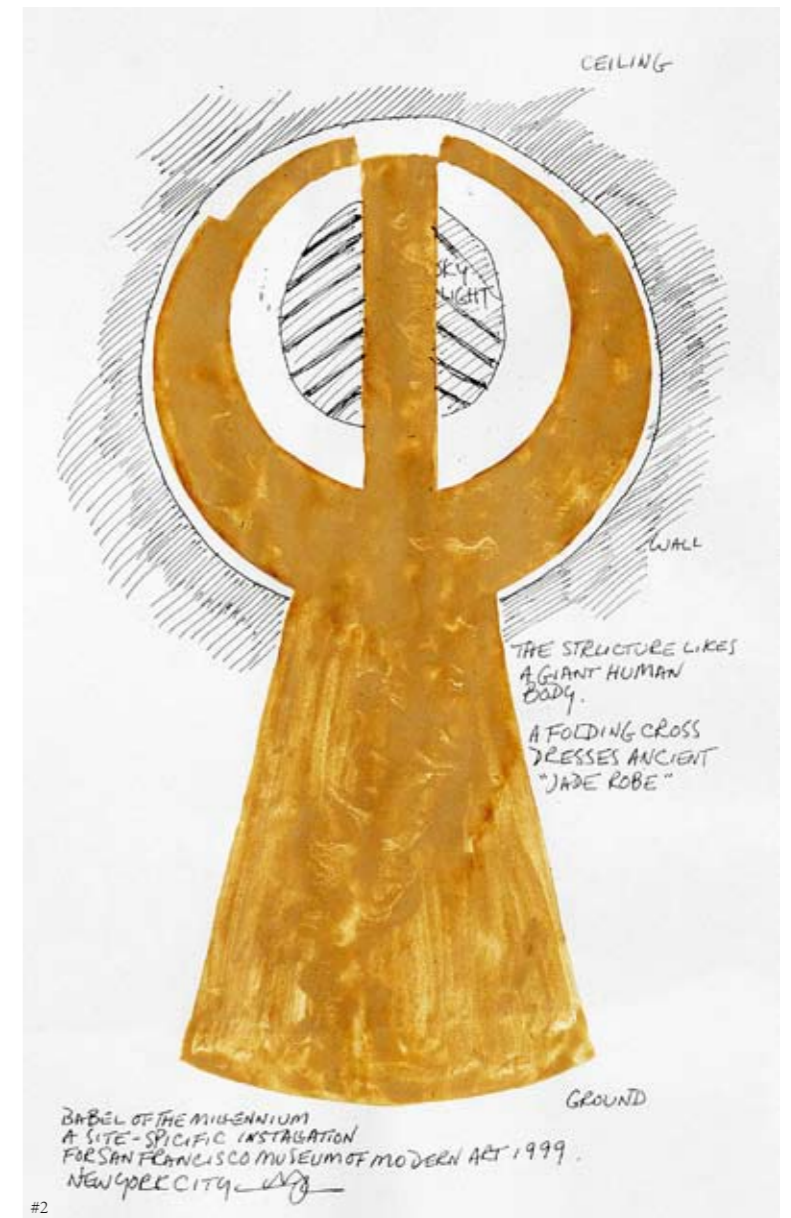
“联合国”艺术计划充分意识到我们时代的许多文化和艺术课题，这些课题在当下的国际现实中越来越有分量。从一开始，这个计划就试图成为一面三维的镜子，反映出整体上全球的生物/地缘/文化上变化的环境。从这个计划的全球化长远发展来看，它的目标是总结从单个分部作品导致的种种可能现象，并将整合的现象引向以现代人性为基础的共同目标。

以我作为一个个体艺术家十几年在中国、八年在全世界各地获得的文化、政治、种族和艺术的经验，从文革期间画革命宣传画到创作这个世界性的艺术计划，“联合国”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旅程。由于在建造纪念碑的过程中遭遇不同种族和文化，这个旅程给了我面对我一直着迷的东西的机会：埃及金字塔，非洲神话，罗马帝国，美国式冒险，柏林墙，中国的丝绸之路和长城。这些文化中的精神一直是我灵感的来源。

在“联合国”计划于不同国家的实施中这个观念导致了一些戏剧性事件。我希望通过“联合国”计划和许多分部性纪念碑作品来向两个方面推进：个人的与政治的，地方议题与全球话题，当下性与永恒性。

基于全球生物/地缘/文化的迅速变化，在接近新的千年之际，我为“联合国”艺术计划的观念、策略和方法设定了几个实施的思路：第一，整个计划分为两部分：国家纪念碑和“联合国”的最后纪念碑。第二，每个国家纪念碑分为两部分：当地人的头发（该计划唯一的材料）和当地的历史上下文（观念）。第三，它不是通过想象或阅读有关文化的资料然后在个人工作室根据得来的信息制作作品，而是（通过收集头发）提供与当地民众和文化史（观念参照）的实际接触、互动和遭遇，我相信实际的身临其境的经验远比文字解释更真实、更重要。第四，“我”作为发起者和执行者，我的生物/地缘/文化身份成为形成这个文化对话、冲突和可能的对抗的重要元素，当我被埋入除了“联合国：中国纪念碑”之外的其它纪念碑中时，这个位置会不断产生“我是谁”到“我不是谁”的问题。它也为我们星球的每个人提供可以与之发生联系的国际“游牧者”。

这四个实施的思路创造了绝对真实的情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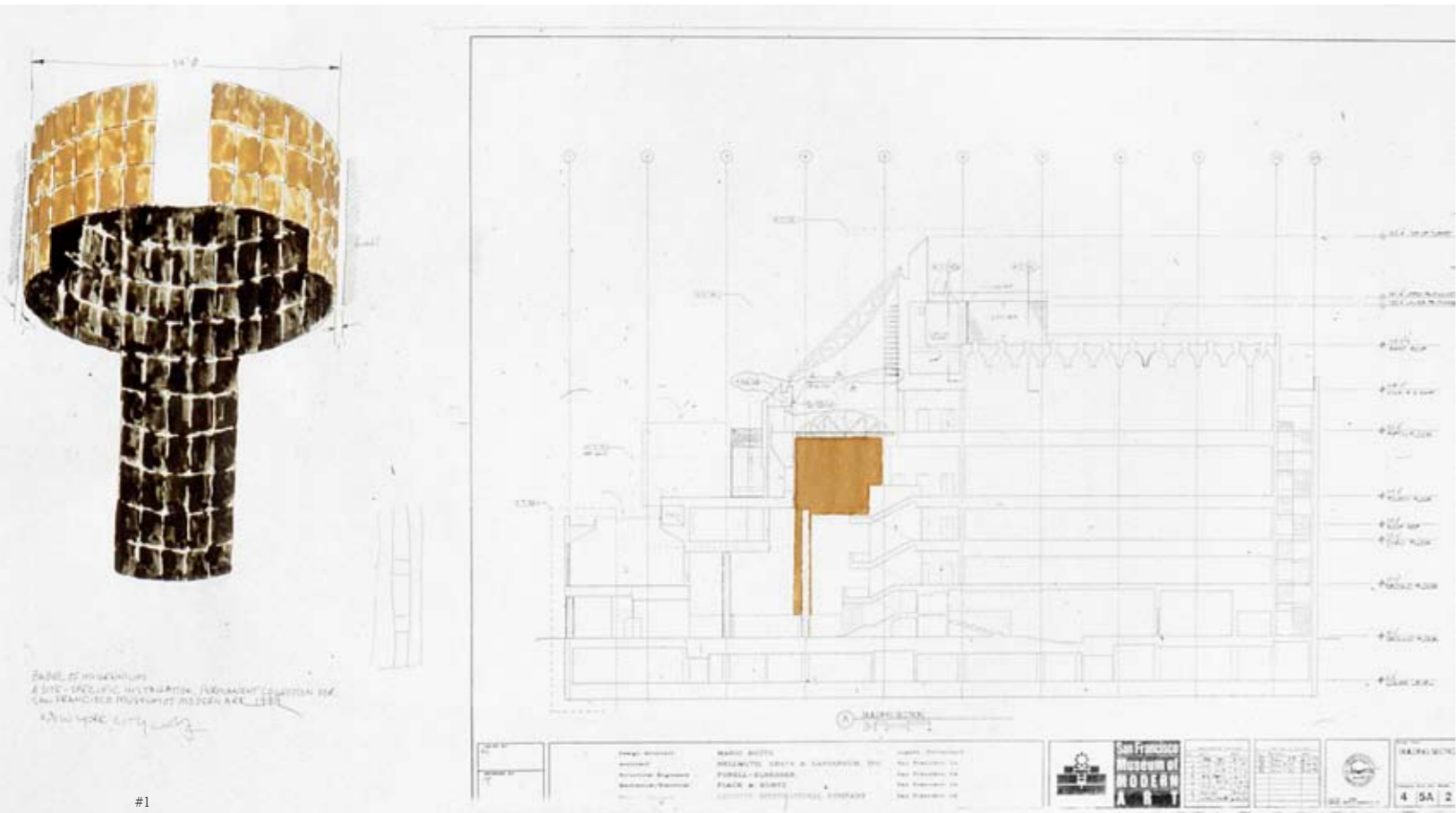


它完全适合超越“它者化”、“地域化”、“跨文化化”等等的当今生物/地缘/文化变化。在这个观念性作品的实施过程中，当地的种族的身份及其文化被我这个“陌生入”“它者化”。同时，我自己的身份也被“它者化”，因此也融入“陌生入”和他们的文化中。这是一个双重的“它者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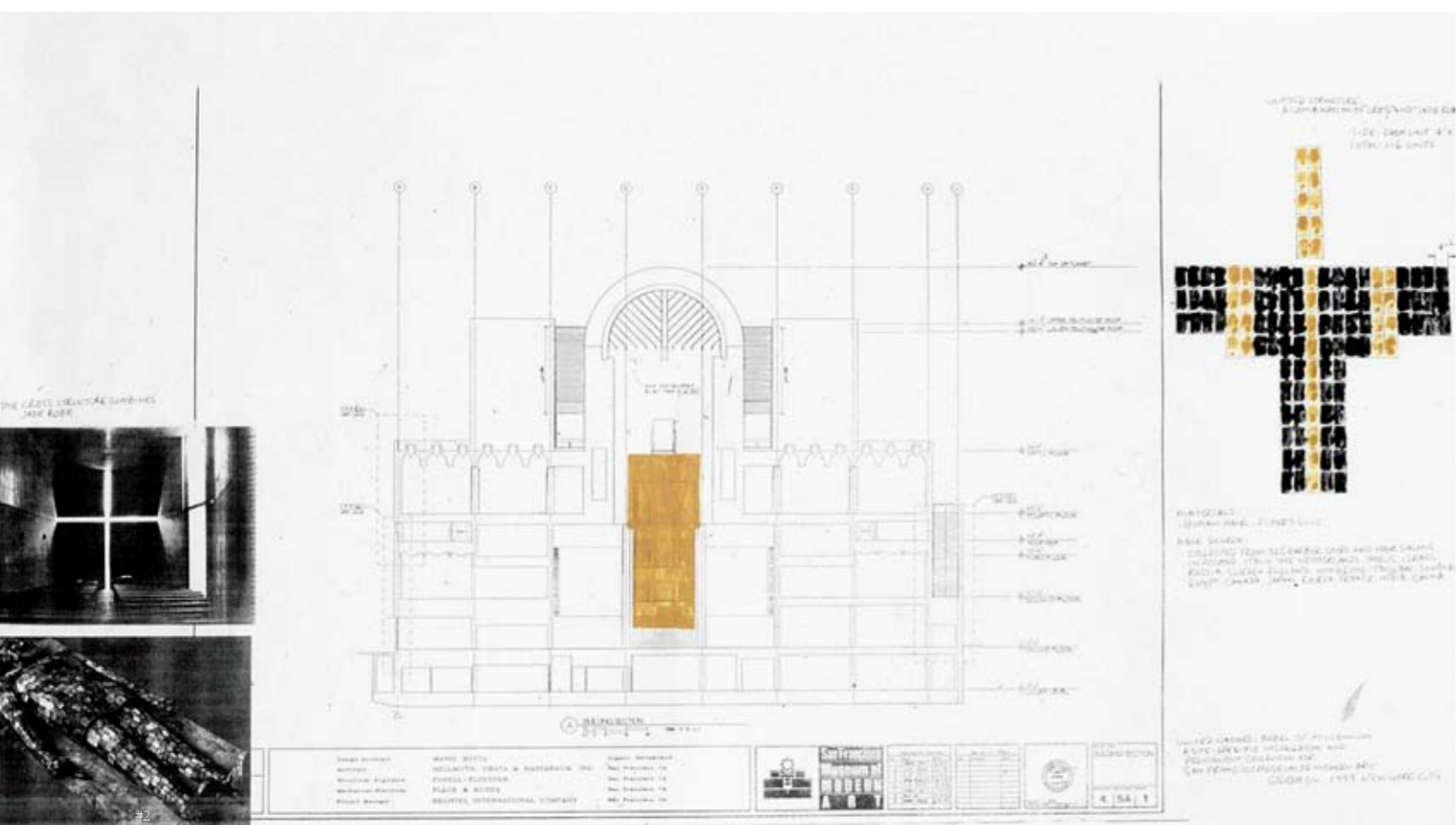
“联合国”遭遇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它产生了对当地观众和我本人而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心理。当当地观众站在他们的历史背景中用他们的头发制作的纪念碑之前时，一方面他们有着深深的民族自豪感，同时又觉得他们和他们的文化被一个“陌生入”“入侵”和“占领”了。这样便产生了深刻的、矛盾的、论式的对话，和对当地观众与作为创作者的我之间的

#1 联合国一千 年塔 装置 谷文达

#2 联合国一千 年的巴比伦塔 草图 谷文达



#1



#2

“自我”的重新界定，这是意味深长的，非常有趣的。它揭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互动。于是，像一个批评家以正面的口吻所说的那样，“‘联合国’计划以模仿嘲讽了文化殖民者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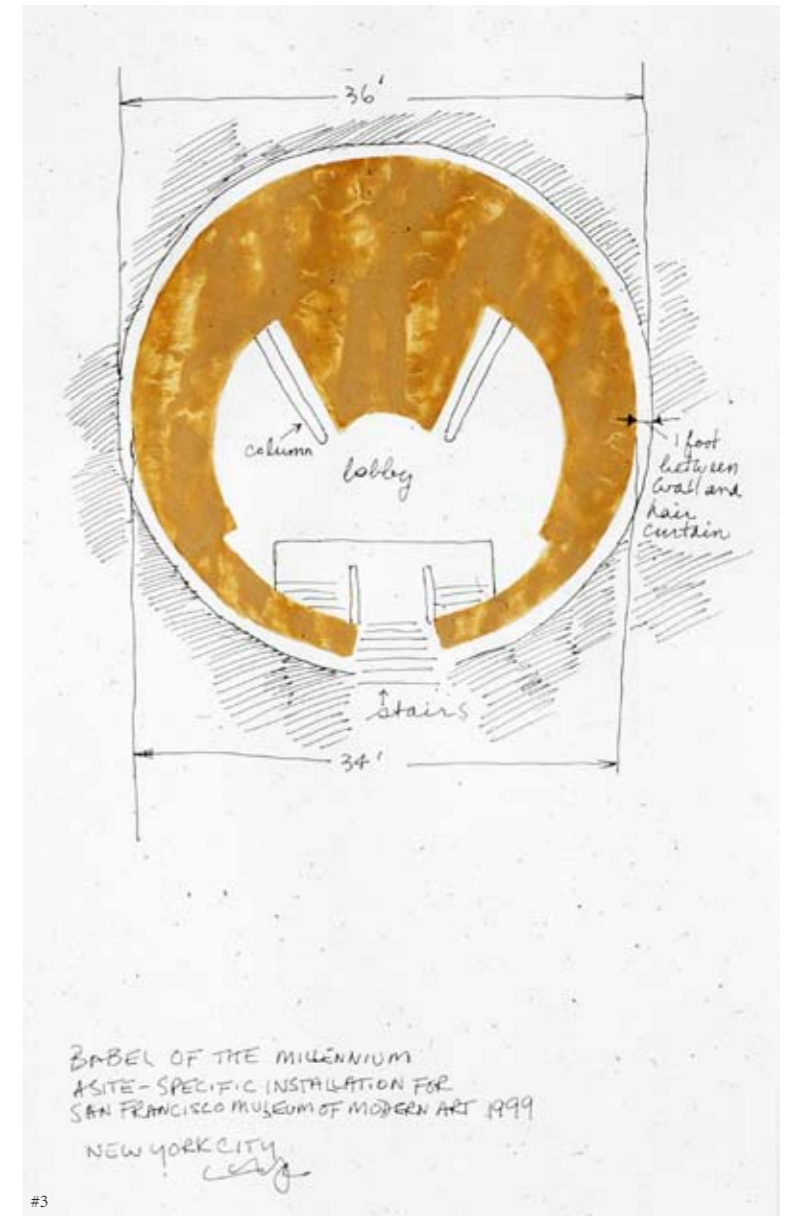
当在非常多样的种族和文化环境下的整个工作在七年的过程中进行时，理性和生理的工作情境将被界定为“内”与“外”，“向内”与“向外”，“整合”与“分离”，“身份”与“它者”，“尊重”与“进攻”，“矛盾”与“和谐”。

在一个特别的个案中，一位看过“联合国”的观众说，“它是我们的头发，应该由我们的手来做。”这句简单的话清楚地划分了两方，就像在一个纯粹的“氧气筒”中一样，地方的文化和我都被“它者化”了；通过创造新的东西，双方都在心理层次失去了身份，它也导致了重新界定身份的强烈欲望，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令人激动的论。在整个计划中，有着单个人体材料头发和多种族“身份”的对比，而这种单个人体材料将被转化为“多元文化头发”，我将其称之为“伟大的单纯”，它将升华为一种“普世身份”。它是“伟大的”，因为它具有多样丰富性，它是“单纯的”，因为它使用了单一的人发材料。

此外，“联合国”的国家分部纪念碑并不完全是分离的实体。它们像一个个的“链环”，每个纪念碑都在先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们会越来越复杂、多样，最后达到整合所有国家纪念碑的结局。有时候，我会将两到三个分部作品连在一起来突出特定的世界性话题。比如，1996年1月我将把瑞典和俄国纪念碑合二为一作为斯德哥尔摩国际性展览《国际刑警》的一部分，显示后冷战时期东西欧之间的冲突。一个埃及、中国和意大利三合一的纪念碑可以成为这三个截然不同的宗教和文化的文明里程碑的极好参照；而一个中国与美国的二合一的纪念碑可以凸显两个世界强权之间的巨大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对立。然而，所有这些分部的纪念碑及其各自的话题将在以美国为实施现场的“联合国”计划的最终作品中融为一体。

**“主体再现主体” 作为战场的人体，作为确证的人体材料**

“联合国”艺术计划受到来自两种观念的挑战：人体的迷思和多元文化。我相信这两个因素产生了新的人文角度，颠覆了我们传统的实践。在走进现代世纪的终点，面对新千年的时候，我们不仅卷入了诸如东西方在生物/地缘/文化变化中的文化冲突，而且也越来越惊诧于当今的生物科学和基因研究的新成果，它们现在已经有可能制造出人工的新物种，包括“人造的人”。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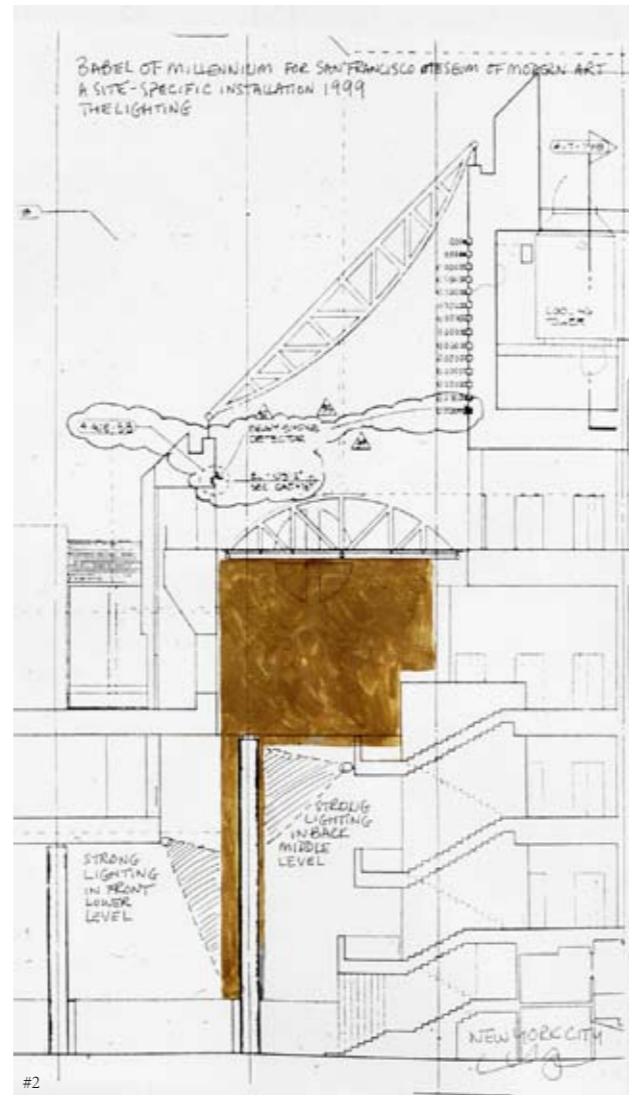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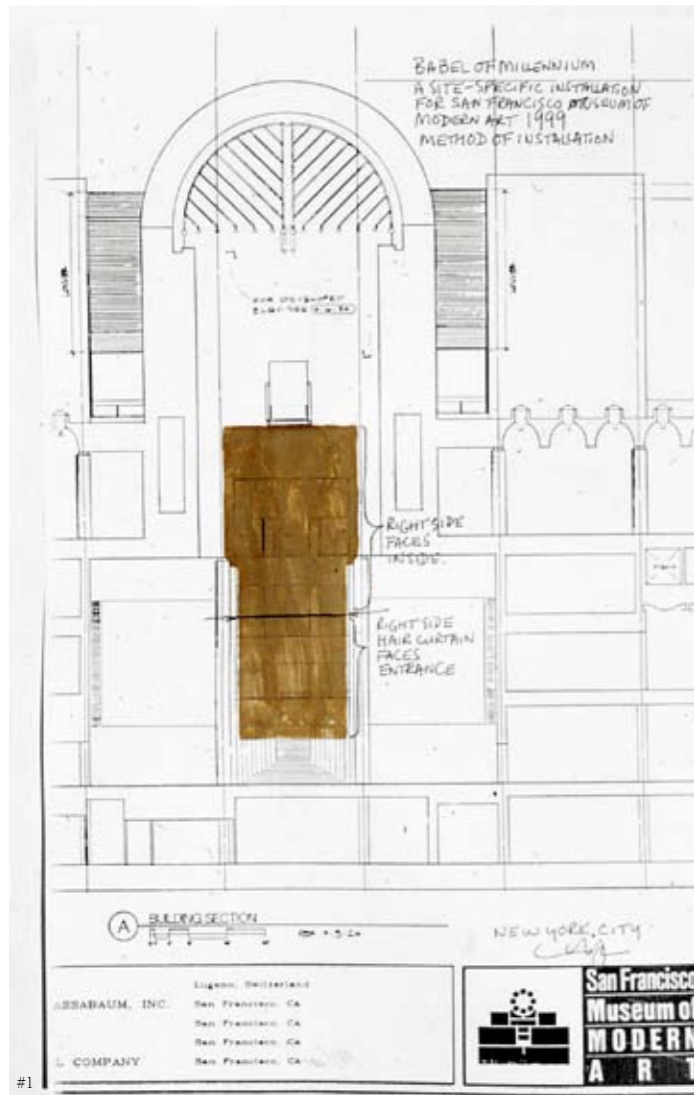
#3

使我们质疑人的本性的道德伦理特性，却还是被这种本性驱使向前。

六十年前，奥尔德斯·赫 黎出版了他的惊世骇俗的《勇敢的新世界》一书（1932），安德鲁·金布瑞尔则写下了《人体商店》（1933），这两本书“将现代社会的光辉面和黑暗面都放在聚光灯下供公众详加审视。今天，赫 黎的观点已迅速成为普通常识，工程科学的原则和大生产的技术一头撞进了生物学王国的内部，侵入了一度神圣的生命领地。基因密码被译解，科学家开始重新安排生命的蓝图。他们在物种内和多物种之间嵌入、删除、重组、编辑基因，或将基因系列程序化，以此打好第二次造物的基础——由市场力量设计带有商业目的的对‘人’的改造。我们在全球市场上以自己的灵魂去换取我们的肉体器官的高价。跨国公司像苍蝇一样群聚在人体上，尽可能剥夺我们的一切器官、组织和基因。现在是我们起来 除魔鬼的时候了，是将自己从迅速到来的勇敢的新世界的掌控下解放出来的时候了。”

这种跨种类器官移植的第一个实例是1984年的有名个案，当时科学家

1 #1-3 联合国一千年的巴比伦塔 草图 谷文达



试图将 的心脏移植到一个叫费伊的婴儿身上以拯救她的小生命，但没有成功。六年后免疫学家麦可·麦坎博士作了一系列成功的实验，他将人类胚胎的器官和组织——诸如胸腺、肝脏、淋巴结——移植到先天免疫系统缺损的老鼠身上，几天后，这些器官和组织在老鼠身上成长起来，产生了人类免疫系统细胞。然后这些被称作“人化的老鼠”被感染了白血病或艾滋病，产生的病毒可以用来仔细研究。人类自身的移植在两个个案中达到了一定深度（虽然还有疑问），在其中女性病友希望使用自身的胚胎组织来做医疗用途。案例之一是一位妇女计划使用她父亲的精液做人授精，以至于基因上相同的细胞可以用来治疗他父亲的阿兹海默症；案例之二是一位妇女要堕胎以使用其胰腺细胞治疗她自己严重的糖尿病。

历史——尤其是西方文明史——告诉我们，人类是宇宙的中心。由此观点，人类的研究和知识是向外的，我们从人类中心的立场操纵甚至虐待世上的一切。后来，我们向外的动机产生了利益也产生了危机，向内看便成了潮流，人类回头审视作为伟大的未知的神话的身体。物质的具体的世界是真实的、优先的，人类的知识则是第二位的。

从1988年起，我将艺术重点转移到人类身体及其基本物质上。第一个系列的作品题为“重新发现俄底甫斯”。在这个系列里，我选择了充满文化与政治禁忌的特别的人体物质。当我了解到，今天任何艺术媒材都没有独特的身份，我即有意提升人体材料到一个全球的层次。

从1989年起，我在实施这个系列的观念中运用了作为主体基础的人体材料。纯粹的人体材料自身没有视觉的或语言的幻觉的成分，它们作为陈列于博物馆或画廊的客体的艺术的对立物存在，它们和观看他们的人一样真实，因此能够在深刻的精神呈现的意义上深入我们的心中，故而我称之为“沉默的自我”。用于这些作品中的每一种人体材料都经历了不寻常的解构过程，所以我又称之为“后生命”。

作为与“思考的大脑”相对的“思考的身体”的观念是从正常人体系统的人体材料中抽象出来的，它又解构了这种材料。这种观念隐含了“身体的本质”和“精神的本质”的思想，它也向我们的生与死的观念发起了挑战。我的创作方法侵入了“沉默的自我”和“后生命”，又使它们在整体上超越了传统、道德、死亡、宗教和文明。

除了社会、政治、性和宗教的考虑以外，这些作品的艺术史的意义在于，我在艺术中排除了

再现。传统上艺术史是对通过一种媒材来再现客体的艺术的研究，在我对这个概念进行探究后，发现唯一能够摆脱这个艺术史客体概念的材料是人体物质，人的本质是宇宙中最终的和唯一的“主体”。

“联合国”计划的每一个国家纪念碑都是由纯粹的当地人的头发建造的大体量建筑性作品，需要大量的剪下的人发。收集当地人的头发需要很长时间，通常要花费三到四个月从二十到四十个理发店去收集。这个特别的工作过程提供了一个观念：人体的废弃物被转换成了当地的文化纪念碑。当地的观众和我站在这个“头发”纪念碑前时，似乎废弃的材料被重新注入了人的精神。

当大量的人发变成头发砖、头发帘形成的墙和头发地毯时，会产生一种心理和生理冲击的奇特效果，这绝对是一个再生的过程：即从“身体的废弃物”到“生物/文化纪念碑”的转化。在斯德哥尔摩，当代艺术与建筑中心将使用当地工厂的设备制造人发产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过

程：活人的“副产品”通过无生命的及其“压制”、“烘烤”、“切割”成头发砖和地毯的形式。我觉得这里的观念已经超出我们的语言界定其准确意义的能力，它不是简单的将人的“灵魂”通过“身体循环或制造”成“人发砖或人发地毯”。这种用人造的机器加工真实的人体物质的奇怪结合使得传统的媒材如木头、金属和石头等在表现性上相形见绌，我将其称之为“对身体的绝对迷恋”。

关于人体的迷思和关于宇宙的迷思一样久远。因此人体材料本身的优越性在于，和那些非人的材料不同，它是一种无需语言的帮助就可以传达特定意义的能指。当人体材料在艺术创造中重新获得生命时，意义是从人体材料自身生发出来的。使用人体材料和非人的客体的差别产生了对立的定义：“内部的”与“外部的”。人体材料的“内部定义”与观众的心理和生理条件相对应。当观众观看人体材料作的作品时，他们理论上是自己遭遇。与此相反，非人的客体材料天生和观众有距离，这种客体与主体之间的、非人的客观材料和观看者之间的心理的和物理的鸿沟需要语言来填补。

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厘清和重新检视关于极少艺术和观念艺术的定义。极少主义的客观物质主义通常因其与人拉开了距离而被描述为一种“超越”。为什么一块木头或金属会被贴上“超越”的语言标签？在历史上，超越的定义是用在特定的人的活动和心理状态上的，因此使用人之外的客观物质并不必然含有“超越”的意义。

我们清楚地看到，观念艺术产生了关于客观物质本身即“内在定义”的语言混乱。人们很容易说（如我们常从艺术家那里听到的），我用这种材料再现此物或彼物，突然间单一的材料变成了一切。事实是，当观众没有阅读艺术家的解释而去观他的观念性作品时，他/她可能无法抓住艺术家操纵的观念。问题在于材料的“内在定义”和“外在定义”不契合。

古代中国有一个这样的玄学故事：两个年轻的和尚争论关于飘动的旗帜。一个说，“风在吹，旗在动。”另一个不同意，说，“不对，是旗自己在动。”两个人争论不出一个结果。这时一个老和尚听到了他们的争论，说，“你们俩都不对，是因为你们的心在动，所以旗才动。”结论是，不管有多少解释旗动的理由，不管哪个理由是对的，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三个人都同意“旗在动”。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极少主义艺术家和那两个小和尚差不多，都是唯物主义者；而观念艺术家则和老和尚相似，属于唯心主义。但他们都忽视了更根本的东西，即“动”而不是“旗”是本质性的。观念艺术家试图通过“旗”（客体）所没有的他自己的知觉去“移动”“旗”；极少主义艺术家则试图将人的知觉（运动）从他使用的客体（旗）中排除，但客体（旗）并没有自身的“运动”来合乎极少主义者所要的“超越”。因此，我们清楚地看到，极少主义艺术家和观念艺术家都处在无法解决的困境中，即在物质和他们的知觉——由内向外的或从外向里的——意义上的困境。

人体材料因其特殊性而与其它媒材截然不同，它（旗）本身即是能指（动），因为它是人体材料，所以不存在观众的知觉（来自外部的运动）和它自身的知觉（自己的运动）之间的矛盾。

此外，关于使用人体材料的概念，我觉得它还有另一个特殊之处，即我以此持续地和我们的“现成品知识”即我们的“传统”斗争。我在一封关于我的装置“重新发现俄底甫斯3号：愉悦与罪过之外之谜”信中讨论了这个争议。

人体材料包含大量的意义与迷思，其寓意与生、死及所有生命中扑朔

#1-2 联合国一千年的巴比伦塔 草图 谷文达

#3 联合国一千年的巴比伦塔中英文发帘 谷文达



迷离的、未能解决的问题相关。在艺术中第一次使用人体材料揭示了令人震惊的现实与传统知识之间的边界，这种传统知识曾经创造了我们深信不疑的“现实”，即幻觉性的现成价值和信念。

作为大量使用人体材料的“重新发现俄底甫斯”系列的令人吃惊的结果，我发现自己处在不再相信幻觉的价值和倒错的信念的现实的有力辩护者的位置上。这常常被现在的政治正确所拒绝，作品得到的反应常常是“恨”或“爱”两个极端，观众要么得到格外内在的印象，要么产生激烈的冲突。我们清楚地看到，观众可以重新发掘出许多话题，提出许多问题；我也提出许多谜一般的问题，我自己和观众都无法回答。一个包含智慧和深思熟虑后的挑战可以激发“令人震惊”的反应，这种“令人震惊”的现象来源于多个渠道，它们是“令人震惊”现象的本质，而“令人震惊”实际上只是表面的现象。

人体材料自身的大量谜一般的内涵（“内在定义”）和公众对它们的强烈反应、解释和误解（“外在定义”）之间的冲突产生了意识和下意识之间的谜一般的情结，它几乎成了无法摆脱的困境。由于人体产品的美、敏感性、与观众的奇特的关系、对生与死的呼唤、作为废弃物的恐惧，对这个作品的总体反应从严重“排斥”、感到“恶心”到困惑的发问都有，最后，观众认识到，“这就是我们自己。”

从人类中心出发欣赏、解释一件艺术品、从向外看客观世界到向里看“我们自己”，会产生深刻的误解，这就是人类的知识所关注的，……有战斗，……有定罪，……这就是我们应用于自身的角度和手段。

### “头发遗产”——浩大的头发海洋 为“联合国”融入普世身份

“联合国”艺术计划统统使用单一的人体材料——纯人发。头发是一种能指，其中包含非常丰富的历史、文明、科学、种族、时间选择、甚至经济

的隐喻。通过这个计划在不同的旅途中实施，它从单一国家的身份（一个国家的纪念碑作品）发展到多个国家的身份（最多达二十个国家纪念碑作品），最后达到人类普世身份（在最后的“联合国”计划的纪念仪式中建造联合的国家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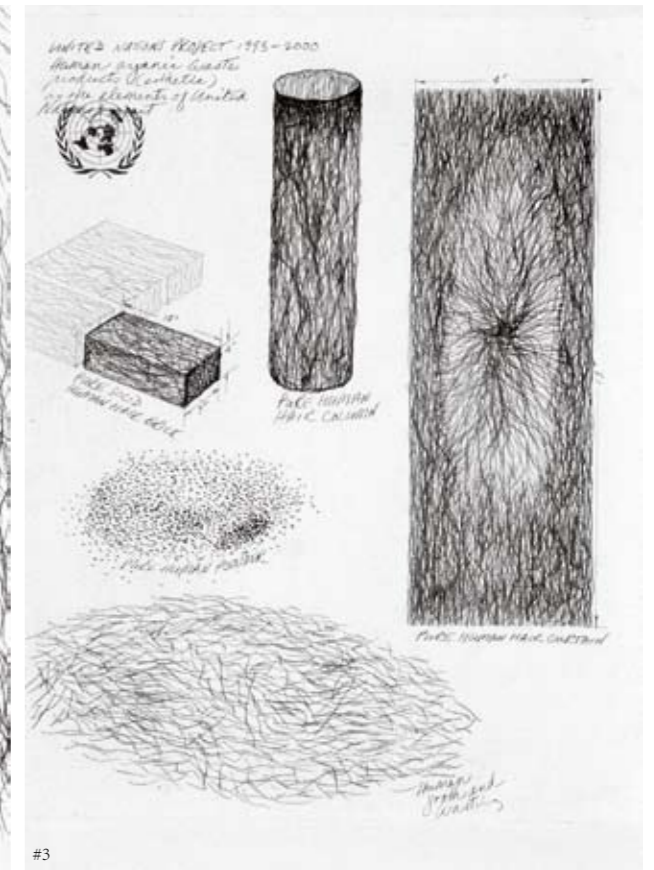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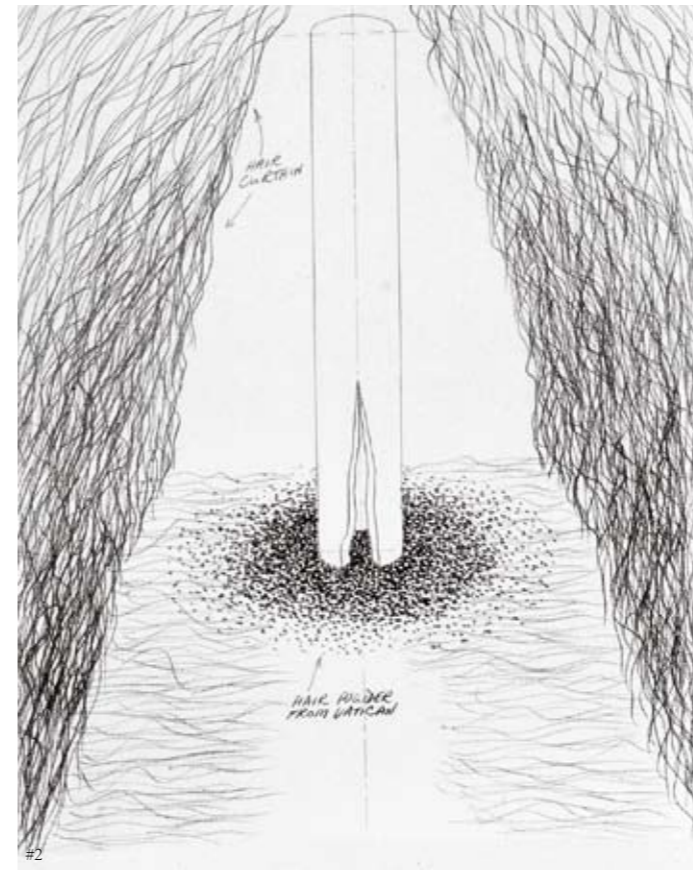
通过“联合国”计划，这种人体的派生物或“废弃物”变成了伟大的人类“头发遗产”，它成了一个地缘的、国家的、文化的身份“大熔炉”。

按照一个古老的关于心理和生理的谚语的意思，头发具有多数古代（以及现在的）有意义的象征价值，可能主要是因为其特别的对个人的活力和精神性的代表性。它常常被与小草及其成长、大地的创造力量联系在一起并非偶然。因此，这种纯粹的有机成分变成了一种可以体现精神自身的精神的隐喻。

流泻般的长发在一些文化中被贴上原始和不开发的标签，但它却是精神自由的表达，和对人的活力的主观性的、文化的身份的确认（如同在美洲印第安人那里见到的那样）。头发曾经是而且仍然是被视为“灵魂的所在”。

圣徒的发 被视为圣物，它们被精心保存在天主教堂中供人膜拜。

剪断头发或削发意味着放弃（权利）和牺



牲，而任其自由生长在历史上则有确认权力、优越性和忠诚的意义，在一些文化中或某个历史时期中，它代表着对社会限制和国家组织的法律的挑战（如美国的 皮士和垮掉的一代）。

……它也可能暗指关注生与死之谜的质询的力量，这与一些人相信——根据 的法则——宇宙是由“大爆炸”“创造”且注定走向毁灭的思想有相通之处。”

“联合国”艺术计划的真正力量在于，它不仅是一种艺术呈现，也通过人发墙体现活着的人的存在。

### 探究多样文化，凸显国家身份 “联合国”最后仪式的深远意义

很久以前，有一个老人琢磨着移走一座大山，他把这个主意告诉他的妻子和孩子，他们笑话他说，“这怎么可能？你疯了吗？”老人说，“这是可能的，我们一锹一锹地挖，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挖下去，这座山就会变得越来越小，我们挖不完，孙子辈还可以接着挖，一代一代地挖下去，不管山有多高，它最后一定可以搬走。”

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寓言故事。

1993年初，我决定实施“联合国”艺术计划，我觉得这个计划的实现是现在这个历史时刻

新的、全球的生物/地缘/文化的深刻象征。我不会简单地满足于从世界各地收集头发，然后完成作品。我的直觉告诉我更有深的东西可以挖掘。今年春天，我有了一个很棒的主意，即我打算在世界上的那些有战略重要性的国家制作国家分部纪念碑，然后在“联合国”计划的最后仪式中把它们整合起来。

这个思考产生了一个观念性的策略方法，我相信一个有力的方法是如何计划的关键。在这个结构里，我有一个清晰的计划，即在七年的过程中建造国家分部的纪念碑，这些单个的纪念碑是“联合国”计划的生物/地缘/历史文化的能指。这个观念会持续地呈现与不同的在地人群及其心理/生理/历史和文化的冲突。由于在各个国家发生的事件在现象学意义上的多样性，它不可能是在制作中设计好的生物/地缘/文化的偶然行为，这是我引证这个中国寓言的原因，挑战和灵感使得我的能力得以提升。偶然出现的困难是这个观念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会全神贯注地思索，该如何在如此多样的文明——它们从我的艺术生涯开始时就给我带来灵感——里建造这些国家纪念碑。

这个作品仰赖于无数的当地理发店、政府机关、艺术和文化机构以及“当地人手”的协助。“因为这个作品的非商业性，政治游说和与官僚程序打交道成为他艰苦工作过程的一个有机部分。行政事务、计划和收集都是这件作品意义的根本，如同在克利斯托或安·汉密尔顿的作品中一样。”（节选）